
从雷娜·普罗梅书信看中国大革命及身处其中的宋庆龄

朱玖琳

《近代中国》第 28 辑，2018 年 7 月出版

【提要】雷娜·普罗梅是美国女记者，她带着要拯救苦难中国人民的朴素愿望来到中国。在北京，她迅速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情者，在李大钊指导下主编国民党左派报纸《国民新报》的英文版。跟随中国大革命的洪流，雷娜夫妇从北京来到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继而又到武汉。她先后在李大钊、陈友仁、鲍罗廷的指导下工作，并忠实于宋庆龄。大革命失败后，雷娜陪伴宋庆龄秘密从上海赴莫斯科。1927 年 11 月 21 日，雷娜在莫斯科死于脑炎。雷娜身后留下的日记式书信和片段日记直观地反映了她所目睹的中国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过程，折射出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的重建国民党计划从酝酿到实施的曲折过程，以及苏联在党内斗争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左派领袖建党计划的态度和鲍罗廷回国之初的命运。结合相关史料进行分析，雷娜书信和日记也纠正了我们长期以来的许多史实认知错误。

【关键词】雷娜·普罗梅 宋庆龄 鲍罗廷 陈友仁 国民革命 莫斯科

雷娜·普罗梅（Rayna Prohme）是美国女记者，1925 年夏来华后，与丈夫威廉·普罗梅（William Prohme，昵称 Bill）一起投入中国大革命，跟随中国大革命的脚步从北京到广州再到武汉，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陪伴宋庆龄从上海去莫斯科，1927 年 11 月 21 日在莫斯科病逝。

雷娜身后留下了数十封日记式书信和片段日记。雷娜书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雷娜给好友海伦（Helen Freeland）的 13 封信，时间跨度从 1926 年 9 月至 1927 年 10 月。这 13 封书信和雷娜丈夫威廉·普罗梅（William Prohme，昵称 Bill）致海伦的 2 封信、雷娜好友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致海伦的 3 封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致雷娜母亲的 1 封信，以及 1926 年的数期《国民新报》等资料一起，存放在一只鞋盒中，由雷娜的另一位好友玛丽安（Marian Parry）保存。1975 年玛丽安将它们交给学者 Arthur J. Knodel，要求其将这 13 封信全文公开出版。第二部分是雷娜给丈夫比尔和妹妹格蕾丝（Grace）信。雷娜给妹妹的信只有 4 封，给丈夫的信有 20 封，还有一封未写完。

雷娜给比尔的信起自 1927 年 8 月上海分别，直至雷娜去世。大部分信比尔在雷娜去世后才收到，还有些信他从来没有收到过。比尔在 1935 年自杀之前将这批信连同雷娜日记全部寄给了格蕾丝保存，并给她写了一封说明信。这部分书信是学者 Baruch Hirson 在研究曾在华工作的美国共产党员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的资料时接触到的，格拉斯恰巧是格蕾丝的第二任丈夫。上述两部分书信原件及日记现均存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

两位学者清楚地意识到这批书信和日记的价值，联手将它们整理出来公开出版，并撰写了大量解读文字。其中少数解读因作者中国历史知识欠缺而有错，本文撰写时已做纠正。

正如两位学者所认识到的，雷娜书信和日记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她所亲历的中国大革命和她所接触的中国大革命核心政治人物，尤其是宋庆龄和围绕在宋庆龄身边的鲍罗廷和陈友仁等人。

一、雷娜的来华之路

雷娜·普罗梅是美籍犹太人，本名 Rayna Simons，中文名彭瑞娜。1894 年 1 月 23 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 Joseph Simons 是个成功的粮商，曾做过美国商会副主席。犹太家庭重视教育，雷娜因而嗜书如命；家中长女的身份又使她早在中学时代就表现出自由独立的性格。高中时，她与犹太同学 Samson Raphaelson（昵称 Raph，日后成为好莱坞著名编剧）相恋。俩人一起考进了美国排名前五的伊利诺伊大学，并一起编辑校刊。在伊利诺伊大学，雷娜结识了很多激进的朋友，但她本人当时并非激进分子。雷娜诚实、热情和执着的性格让她周围的人都非常喜欢她。日后成为美国著名的天主教工人运动创始人的 Dorothy Day 在其自传中回忆雷娜时对她做了生动的描述：

雷娜一头明亮而蓬松的火红卷发如燃烧的火焰一般衬托着她的脸庞，使她的脸透出阳光般的明媚。她的一双大眼睛是温暖的红棕色的，总是微笑着专注地看着你……她的嘴唇很厚，充满孩子气，脸颊上有一对酒窝。……无论做什么事情她都全身心地投入。如果在读书，她便完全沉浸其中；如果和你在一起，她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在你的身上。她思想专一，心地纯洁，对生活的热爱就像对书本一样。

1917 年，雷娜以优异的成绩在伊利诺伊大学毕业。1918 年她进入芝加哥大

学读哲学博士，但是因与 Raph 结婚而退学，随后与他一起去了加利福尼亚州，进入伯克利加州大学读书，主修经济学，并依旧对文学、哲学、比较宗教学、人类学兴趣浓厚。在伯克利加州大学，雷娜与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教授和记者成为朋友。^①

1922 年，雷娜与 Raph 开始分居。次年 7 月，她只身来到中国，这是她第一次来华。因为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她要亲身在华观察。当时的雷娜对中国革命毫无概念，她准备在中国待上 5 年，并天真地认为她能够阻碍中国革命的脚步。她说：“我希望亲眼目睹一个人在他们熟悉的世界突然变得陌生而奇怪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当他们古老的社会习俗被颠覆，当他们的宗教受到挑战，当他们的居所、城市、语言、服装、唯一的观念被改变的时候，我想看看他们会发生什么情况，并且去帮助他们，如果我能够的话，我要让新生力量处在控制之下，我要让变化不要来得那么快。”^②

在加利福尼亚时，雷娜经 Raph 介绍认识了记者比尔·普罗梅（Bill Prohme）。比尔对雷娜一见钟情，雷娜的离去让比尔伤心欲绝，不久便病倒了。1924 年，在中国待了一年还不到的雷娜回国照顾病重的比尔，并与比尔结婚。年底，两人一起去火奴鲁鲁，在那里做了 6 个月记者后又一起赴日，不久便一起来华。

二、从北京到广州

1925 年夏末，雷娜和比尔一起来到中国。在北京，雷娜受聘为一家英文周报工作，比尔则为北洋政府国务院情报部主任宋发祥的中美新闻社（*Chung Mei News Agency*，又称中美通讯社、中美通信社）和《中美晚报》工作。中美新闻社名义上是中美合办，事实上只是宋发祥个人经营的通讯社，他对外宣称是美国的通讯社只是为了逃避政府干涉和军阀摧残，但为了避免被外人喧宾夺主，他从来没有向美国注册过。^③宋发祥与冯玉祥关系密切，冯玉祥占领北京时，利用中美社和《中美晚报》充当他的宣传工具。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在各方盛传苏俄与冯玉祥缔结密约借款购械维持战事时，比尔曾就此事采访驻京苏俄大使加拉罕，但加拉罕矢口否认。^④

^① Rayna Prohme: *An American Woman in 1920s China*, by Carol Lew Simons and A. Tom Grunfeld, *China Reconstructs*, April, 1989, P43.

^② Baruch Hirson and Arthur J. Knodel, *Report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P25.

^③ 王新命著：《新闻圈里四十年》下，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3 月，第 270 页。

^④ “加拉罕为苏俄辩明”，《申报》1926 年 8 月 6 日，第 7 版。

1925年11月，雷娜在报上看到陈友仁获释进京的消息后，主动写信约请他茶叙。^①此时的雷娜对中国政治非常感兴趣，并且日益倾向左翼。这次与陈友仁的会谈很成功，陈友仁在12月离开北京去广州之前，安排雷娜和比尔为国民党在京新办的报纸《国民新报》（People's Tribune）工作，而比尔同时仍继续为中美新闻社和《中美晚报》工作。陈友仁在即将动身离开北京时前来向雷娜告别，并以和同志谈话的态度跟她谈了以后一起工作的可能性，这让雷娜深受感动。在他离开房间时，他默默地转过身来对雷娜说：“国民党永远不会忘恩负义。”^②这戏剧性的一幕给雷娜留下了深刻印象。

《国民新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左派办的报纸，1925年12月创刊于北京，分中文版、英文版、中英合并版三种，其宗旨是“主张国民救国，宣传民族自决，打倒帝国主义，铲除黑暗势力”。^③陈友仁是该报的英文记者。因为该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印行，雷娜因而结识了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具体指导下工作，同时也为李大钊本身的工作提供帮助。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因遭段祺瑞政府通缉，李大钊率领国共两党的党部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雷娜于是每天进出苏联大使馆与李大钊会面。雷娜对李大钊充满敬意，她在给密友 Helen Freeland 的信中介绍李大钊道：“他是我们报社的上级。我几乎每天都去见他，从他那里获得新闻等等，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年人，他的一双手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手。他对我耐心得都让我觉得过意不去了。”^④

在形势日趋严峻，连发报员都离去的情况下，雷娜还承担了为李大钊发送电报的工作。李大钊曾特地为此于4月10日致电加拉罕询问雷娜的报酬问题，他说：“马伦先生走之前，我和罗欣同志决定，由普罗梅夫人代替他发送我们的电报，而且必须给她报酬。这一封电报就是她而不是马龙发出的。她想知道，为发电报她能得多少钱？她的月工资又是多少？请将这些情况立即告诉我，然后告诉罗欣同志，因为她希望今天晚上就得到答复。”^⑤李大钊对雷娜的工作十分满意，在雷娜应陈友仁之邀去广州后，李大钊对青年共产党员章克说：“章克，瞧瞧雷娜·普罗梅做出的好榜样。看看她对我们的事业是多么的鞠躬尽瘁。她在我们这

^① 见雷娜 1927 年 2 月 19 日致 Helen 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66.

^② 雷娜 1927 年 10 月 26 日致比尔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132; Vincent Sheean, *Personal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0, P298.

^③ 见周芳等编注：《李大钊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年 4 月版，第 268 页。

^④ 雷娜 1926 年 9 月 8 日致 Helen 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36.

^⑤ 周芳等编注：《李大钊书信集》，第 251 页。

里花大量时间为我们工作，但从未有过任何抱怨，即使是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①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在监狱中为回答提取津贴酬劳的账簿上频繁出现的人名问题时，曾提到雷娜道：“彭即彭太太（彭若门夫人），美国人，当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此人现在武汉，应广州陈友仁之约，去办广州英文报去了。道即美国人，因国民报停版现亦到武汉去。道尔逊系接彭太太手，是以薪水与彭太太同。达即道之变名也。鲍性系彭太太约同办报副手，我不知其名号。”^②按照账簿上雷娜和其继任者吉姆·多尔辛（Jim Dolsen）同酬来看，雷娜应该没有因为为李大钊发电报而额外支取报酬，李大钊当然也绝不会招供雷娜为他发电报之事。

1926年4月，张作霖占领北京城，在北京封闭进步报馆，对宣传“赤化”的新闻记者大开杀戒，中美社和《中美晚报》也在被查禁之列。9月8日，雷娜在给Helen的信中写道：“比尔为之工作的新闻社和报纸曾经是国民军的喉舌，上周也遭遇险境。一天晚上，宪兵来封闭了这个地方，封了报纸、新闻社汉文部和新闻社英文部。比尔在几天前看上去已经失业了，但是最终他们又开放了新闻社英文部。汉文部依旧被封闭，只开过一次以便警察可以进去抢东西和没收报纸。”她告诉Helen广州国民政府正在北伐，武昌和汉阳几天前已被攻克，吴佩孚控制下的汉口也将守不住了。她希望国民党的北伐能够胜利。^③

虽然北京的形势日益严峻，雷娜夫妇因而也紧张不安，但是因为治外法权，他们认为自己不会有危险，她告诉Helen他们很安全。在陈友仁从广州发来邀请后，雷娜把《国民新报》的工作委托给美国记者吉姆·多尔辛（Jim Dolsen），并邀请朋友米利·贝内特（Milly Bennett）来北京接替比尔为中美新闻社工作。^④

1926年10月中旬雷娜离开北京，途经上海，于当月底到达广州。初到广州，雷娜便见识了广州的工人运动。她告诉Helen，她感觉广州是她见过的最脏的城市。他们暂居的Asia Hotel（不久被外交部吞并为外交部大楼，鲍罗廷住在里面）无人打扫，因缺劳力而面临关闭。广州的工会占据上风，远比美国工会有组织，而且权力意识惊人。

11月29日，雷娜致函Helen说，她将随国民党的政府和党部北迁。但结果

^①此语出自章克在雷娜葬礼上致的悼词，见 *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132.

^②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709页。

^③雷娜1926年9月8日致Helen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34.

^④见 Milly Bennett, *On Her Own: Journalistic Adventur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27*, P97.

是比尔独自先去了汉口，准备力劝已经迁往那里的政府开办报纸。雷娜独自留在广州处理报纸的事情。应陈友仁之约，雷娜在广州主编英文报《广州报》（Canton Gazette），这是一份 6 页的报纸，是刚到广州来的陈友仁长子陈丕士看的唯一一份报纸，但是只看《广州报》的陈丕士依然对周围的事情十分茫然，可见《广州报》并不成功。^①雷娜告诉 Helen，陈友仁说她正在见证中国历史，可是她认为自己只是把从各处搜集来的各种电报消息拼凑起来而已，事实上她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②

雷娜不久便亲身体验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1927 年 1 月 3 日，武汉发生“一三血案”，英国水兵冲入正在英租界附近庆祝北伐胜利的人群中，用刺刀乱刺，致一死数伤。敏锐的雷娜在 1 月 12 日给 Helen 的信中说，她相信汉口一定在 1 月 3 日出了大事，因为美舰受命 12 小时后从菲律宾开拔过来，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船只离开了上海，英国人则命令它的船北上，去增援已经在汉口的庞大舰队。“我们恐怕这意味着战争。”^③

三、从汉口到上海

就在汉口爆发战争危机的档口，2 月 1 日，雷娜以寻夫为名，坐英国客船从广州经上海来到这个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她是船上唯一一个支持汉口的人，也是唯一一名女性。在船上，有人急切地对她说：“告诉宋子文，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派人来找我，我马上就来把他带走。就这么说，他会懂的。”^④

比尔当时正在为国民党的新闻社工作，雷娜初抵汉口时正是陈友仁忙于与英国人谈判的时候。2 月 16 日，她在给妹妹 Grace 的信中记录道：“陈在谈判中不卑不亢。昨天是紧张的一天，前天也是。谈判正在继续，本希望星期一能签署决定英国租界未来地位的文件，但是没有成功，悲观主义者发出越来越多的悲鸣。比尔跟踪着所有谈判，发自中方的消息都是通过新闻社发出去的。他说陈保证过的，不用担心。但是我希望谈判能在以后几天内结束。我夜晚睡觉时梦见炮舰在开来时开跑了。我梦见从直布罗陀开过来的长长的黑色舰队。炮舰当然是灰色的，

^①陈丕士著：《中国正在召唤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8 月版，第 50 页。

^②雷娜 1926 年 12 月致 Helen 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48.

^③雷娜 1927 年 1 月 12 日致 Helen 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54.

^④雷娜 1927 年 1 月 31 日致 Helen 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56.

但是在我的梦里不是。上帝啊，当我神智不清时，我创造了怎样一支英格兰舰队啊！”^①

在武汉，雷娜不再单纯是名记者，她介入到了中国大革命的相关工作中。她在2月19日给Helen的信中写道：“这里最有趣的人是陈友仁和孙逸仙夫人。”宋庆龄邀请雷娜参与妇女工作，为她主持的妇女党务训练班做每周三次的系列讲座。雷娜说：“我很高兴参与这里的妇女工作，因为我可以遇到许多有趣的女性。这里的女性比男性还有趣，因为她们是从难以置信的封闭中豪迈地走出来的。孙夫人是一个极妙的人，我像所有人一样，倾心于她。她非常美，她的高贵让我这个经常局促不安的人在她面前会手足无措。”^②

比尔曾经回忆雷娜3月1日在妇女班的第一讲开讲道：“所有国民党部长都在主席台上。我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坐在一起，他是唯一一个坐在台下的部长。我记得他对她很热情，TV（一位诚实的保守主义者，是这些人里我唯一尊重的一个）并非出于礼貌而表现出热情。他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个完全美国化的中国人，他并非出于中国式礼仪或者是虚伪的礼貌。她的演讲由章克逐句翻译。”^③

在武汉，对雷娜最重要的人可说是鲍罗廷。3月12日孙中山忌日那天，《国民新报》在汉口复刊。雷娜离开北京后，北京的情况日益糟糕，外国记者已不能凭治外法权来保护自己。1927年2月16日，雷娜收到多尔辛的来信，得知北京《国民新报》已经关闭。雷娜于是着手在汉口恢复《国民新报》。她一边忙于准备为妇女培训班做系列讲座，一边忙于办报，而此时比尔又累倒了，鲍罗廷是帮助雷娜恢复《国民新报》的关键人物。雷娜在3月19日给Helen的信中说：“当今中国最大的一个人物救了我，他是高级顾问鲍罗廷。……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我所遇到的人中最有头脑，最有个性，最有社会力量者。我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去讨论组织的困难，得到建议、消息，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了可以做参考的依靠。其他也有我尊重和敬仰的人，但是B是唯一一个我认为能够抓住权力和名望的意义，能够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里的整个运动的人。比尔认为我完全被他所主宰。我想我是这样的。”^④

^①雷娜 1927 年 2 月 16 日致 Grace 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65.

^② 雷娜 1927 年 2 月 19 日致 Helen 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68.

^③*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70.

^④ 雷娜 1927 年 3 月 19 日致 Helen 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P72-73.

在同一封信中，雷娜提到：如果上海被攻克，有可能政府会再次迁移，但对于是否迁都汉口出现了意见分歧，一半人要去南京（少数几个要去北京），另一半人要留在汉口。雷娜当时显然并不懂得分歧的实质之所在。不久上海“四一二”清共和武汉“七一四”分共先后爆发，宋庆龄于7月14日撰写声明，抗议国民党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宣布暂时引退。宋庆龄此篇声明是在雷娜帮助下撰写而成的，于7月18日刊登在《国民新报》上。^①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对雷娜打击很大，她在给Helen的信中描述道：

它开始于3月份的党的分裂，那时蒋介石决定坐镇上海，挣脱党纪束缚，开始他的“反共”运动。他以闪电般的速度屠杀工农领袖。那时汉口非常愤怒，宣布他是封建军阀、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今天，当唐生智像蒋介石期望的那样彻底枪毙所有“暴徒”的时候，汉口却对这个受自己宠爱的军阀保持沉默。湖南陷入恐怖之中，曾经带领革命的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被全部镇压了，群众领袖被砍头、油煎、凌迟、活埋、用线慢慢勒死，等等。这个故事我实在说不下去了。所有工人领袖都逃走或者隐藏了起来。党首们在用一种很无力的方式谈论控制局势走向的必要性，因为“太过分”了，我提醒你，他们说的不是军人“太过分”，而是群众。我不忍心详细向你描述一切。我只知道这种我以前从未有过的幻灭感已经使我无法呼吸。

我最了解和最喜欢的三个人（笔者注：即宋庆龄、鲍罗廷、陈友仁）属于站出来反对反动派的极少数人。尽管遭到强烈反对，但是鲍罗廷还是一直坚持到毫无希望才离开。^②

根据逃离北京从上海来汉口协助雷娜为《国民新报》工作的米利的描述，7月16日，米利目睹雷娜同孙夫人一起离开了汉口。^③事实上，同日离开汉口的还有鲍罗廷等人。他们离开的当夜，鲍罗廷和宋庆龄的寓所即被何健的军队闯入搜索。^④据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在牯岭，宋子文曾来会晤鲍罗廷，建议

^① 详见朱玖琳：《在历史现场——〈自力更生〉读后》，《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16年第1期。

^② 雷娜1927年8月6日致Helen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P80-81.

^③ 见Milly Bennett, *On Her Own: Journalistic Adventur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27*, P388.有作者反对这一说法，认为雷娜·普罗梅的日记说明并非如此。雷娜在日记中清楚地说明她是在宋庆龄离开后，留下来帮助丈夫将《国民论坛报》移交给新负责人，并陪丈夫出席鲁茨牧师的晚宴。然后，在宋庆龄离开汉口两周后，她乘船前往上海。（转引自《走进中国》第379页）事实上，米利没有编故事，7月16日，雷娜和宋庆龄、鲍罗廷等人一起去了牯岭。

^④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213页。

他取道上海离开中国。宋庆龄则劝他绝不要听宋子文的话，从而救了他。^①雷娜在牯岭呆了6天，跟鲍罗廷做了好几次长谈，“鲍罗廷在牯岭时判定（革命）已经没有希望了”^②。7月22日，雷娜和鲍罗廷一行一起乘船返回汉口。^③几天后，7月27日，鲍罗廷一行启程回苏联，经由陆路，途径山西、蒙古、戈壁滩、库伦等地，雷娜非常想参与这一艰苦跋涉，但是鲍罗廷不让。雷娜去火车站为鲍罗廷送行，她描述道：“在火车站，那天下午他乘上了北上郑州的京汉铁路的火车，他鹤立鸡群般地耸立在所有穿着中装来为他送行的政府领袖之中，这种耸立也是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耸立。站台上的这群人中只有一个人依旧忠实，但他不能公开表现，现在也还没有，因为他还没有与这群人关系破裂。火车站没有其他人了，没有群众领袖（他们在数周前都已经逃走了），没有工会代表，没有他的个人助手，除了他自己的一小群人。当火车开出去的时候，他站在车厢门口，官员们列队站在火车站台。B背靠着车厢壁，他笔直地站着，向每一个官员点头致意，然后转回到车厢里。这群人仅此一次面露愧色。我几乎哭着回到家，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哭。”^④

雷娜不在汉口的那段日子里，《国民新报》因为刊登宋庆龄7月14日声明而出现危机。7月17日半夜，由比尔编辑、米利做样张的7月18日《国民新报》在印刷厂印了出来，上面刊登有宋庆龄7月14日撰写的告别声明，即《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同时，比尔跑遍汉口各家电报社，想把宋庆龄的告别声明发给美国报业巨头甘乃特（Gannett），但均遭到拒绝，所幸最后他还是成功地发送了出去。得知《国民新报》上刊登有宋庆龄告别声明后，印刷厂在半夜被军人包围，7月18日的《国民新报》还未来得及上报摊卖就被从印刷厂全部没收了。^⑤

不过7月18日的《国民新报》并非绝版，雷娜和比尔编的最后一期《国民新报》是7月30日那一期。7月29日在接到警告后，他们连续两日都在准备绝版的心态下编辑报纸。7月31日，他们被迫向国民党宣传部长顾孟余宣布辞职。

^①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8页。

^② 雷娜1927年8月7日致Gracen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83.

^③ 雷娜1927年8月7日致Grace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83；“邓演达逃往日本”，《申报》1927年7月27日，第4版。

^④ 雷娜1927年8月7日致Grace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P83-84.

^⑤ 见Milly Bennett, *On Her Own: Journalistic Adventur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27*, P388.

雷娜后来曾告诉妹妹 Grace：“关于那份不顾警告依旧大胆追随原政策的报纸，我们得到即将改组的内部提示。那是在星期五（笔者注：即 7 月 29 日）下午。于是我们立即出版一篇美好的天鹅之歌，并使用一些我们曾经犹豫要不要用的材料。周六（笔者注：即 7 月 30 日。7 月 30 日的《国民新报》刊登了宋庆龄寄自上海的支持国民党左翼的来信）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我们继续做天鹅之歌。星期天（笔者注：即 7 月 31 日）这出有礼貌的小闹剧上演了，以比尔和我向顾孟余签署一份和缓的辞职信而终场。在辞职信中，我们成功地避开中国礼节，宣布我们辞职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们无法忠实地跟从目前的政策走向，在我们看来这使得革命事业失败。辞职让我们很痛苦，我们曾经非常乐于为革命效力。这有点滑稽可笑，因为四个月之前，我们还在请求顾孟余不要去做一个整天喊口号的白痴般的共产主义者而把自己变得像傻瓜一样。那时候，他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们。那时候，只有鲍罗廷支持我们的立场，使得我们有可能跟从我们的思想认同的政策。”^①

雷娜在 7 月 31 日的日记中也同样记录道：“人力车夫罢工了。我早于比尔走出外交部，我得知顾孟余昨夜来见陈，谈了两个半小时多，跟他谈报纸的事情。他说报纸没有按照政府或者党的原则办。他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是报纸依旧归他的部门管，但要进行改组，我们离开；另一个是陈接管报纸。定第二个方案不好，因为陈将负责报纸的每一个字。决定采用第一个方案。两次尝试见顾，但他不见我们。所以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们已经得到通知，还说我们考虑从今天开始断绝关系，并说我们对必然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无法忠实于目前已改变的政策，等等。清理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并离开。”^②

7 月 31 日，雷娜只身启程赴上海去找宋庆龄。在船上，她遇到了带着新婚妻子张乐怡从九江上船的宋子文，宋子文表现冷淡。雷娜日记追溯道：“四天南下的航行有点不愉快，因为宋子文带着他的妻子、Tommy Tong（笔者注：即宋子文秘书唐煜庐）和他的妻舅在九江上船，他们用的全是假名，他们并不乐意与我同行。子文和他的妻子一直待在他们的船舱里。即使有过一次机会，他也没有把

^① 雷娜 1927 年 8 月 7 日致 Grace 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84.

^② *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P76-77.

他的妻子介绍给我。实际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只是在我们在上海登岸时向等待上岸的我点头致意。”^①

8月3日，雷娜抵沪，随即住进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寓所。几天后，比尔也跟陈友仁一起来到上海，但陈友仁禁止比尔去莫利爱路见雷娜。雷娜日记追溯8月3日与宋庆龄的见面和谈话道：“我叫了出租车去孙夫人处，并非直接开到，因为出租车司机不知道地方。大约7:30到了那里。她在等我，看上去她很高兴见到我。她的神经处在极度衰弱状态。她告诉了我一些她的困境，有人来骚扰她，房子周围满是密探在监视，并向她的门童打探消息。她根本无法出去。我告诉她陈建议的计划，而她说她无法考虑直接去苏联，因为得有人在中国对此作出解释。她还谈到对资金的担忧以及如果她取道美国过去所需费用的问题。那一晚没有做出决定，即使是在陈自己几天后到来的时候。最后，由于某次我不知道的讨论，她决定以非官方身份直接去苏联，而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去，为什么这样我并不知道。”^②雷娜曾于8月6日写信告诉Helen说：“我和孙夫人一起在上海。她于7月14日发出声明，在她即将离开汉口的时候，她说她不再参与现政策的制定并隐退。代表了忠实革命和反对军人当政的几位领袖有何行动，我并不知道。也许我们可以为他们所作的任何事情提供帮助，从地理上说，在全球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接下来，也许我们无法，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身无分文地去流亡。我会让你知道我的行踪的。”“我被那些背叛者和腐败者的所作所为搞得焦头烂额。孙夫人，你可以想象，更心焦。她知道更多的细节。这是一幢充满伤感的房子。”^③雷娜日记追溯说：“已经在酝酿驱逐我，我并不知道这到底有多危险。报纸上的零碎消息令孙夫人担忧，我觉得好笑，但她却很紧张。”^④

雷娜住进宋庆龄寓所后，一开始对未来行动没有方向，8月6日她去办了新的护照，但是将去哪里却“悬而未决”，“有很多我们得去或者不去苏联、日本、德国、美国的理由”。^⑤陈友仁每天用日本人的名字进进出出，雷娜去他处见他则必须绕道。雷娜的行踪一直处在她上岸后就看到的上海工部局罪案侦查股（CID）的J. A. Cook的跟踪之下，CID对宋庆龄、雷娜和比尔都安排了跟踪。除了上海工部局，法租界警务处也派了3个人，每天白天像哨兵站岗那样在宋庆龄寓所外站

^①*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78.

^②同上。

^③雷娜1927年8月6日致Helen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81.

^④*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79.

^⑤雷娜1927年8月7日致Grace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83.

着。CID 认为法租界警务处很可笑，但他们自己的盯梢也很荒唐，居然有固定时间，每天从上午 10 点到晚上 8:30。这让宋庆龄和雷娜得以在没有侦探跟踪的时间段秘密地离开了上海。^①

8 月 1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决定“同意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陈（笔者注：即陈友仁）1 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费。”^②本来准备绕道美国去苏联的宋庆龄最终以非官方身份直接去了苏联，而陈友仁则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随同前往，陈友仁以用外国人作宋庆龄的秘书太不像话，“会在中国人中间造成坏印象”为由，给雷娜安了一个国民通讯社驻上海记者的头衔。比尔被陈友仁留在了上海，分配给比尔的任务是给陈写报告和对外发出雷娜发给比尔的新闻电。陈友仁向雷娜和比尔许诺这只要两个月。^③

8 月 22 日凌晨三点半，雷娜陪同宋庆龄悄悄地离开了上海，雷娜日记追溯道：计划定在 8 月 22 日一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走。每一个成员都很紧张，有很多行李要搬，有大量东西要藏。

我们走了。无需记录，我们走时的细节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小车按照计划 3.30 到了；我们飞快地穿过上海那些我不认识的路，然后坐舢板靠向正在等候的船。其他人[包括陈友仁和他的女儿]前一天晚上就已经上了船。黎明到来；我们一直到船开出吴淞口才去睡觉。22 日这一天，所有人都放松下来；我一直在睡觉，有点晕船。

这是一艘苏联船，目的地是海参崴。^④

四、在莫斯科

雷娜日记追溯了在苏联船上的日子：

船上的生活非常平静。孙夫人与鲁宾斯（Reubens）谈了几次话，我听到的内容是关于革命本质和在莫斯科的人。谈话时我退出去了，因为我感觉鲁宾斯希望我这么做。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偷偷摸摸的，有点趾高气昂，妄自尊大，让人感觉像一头蠢驴。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感觉不太舒服。计划似乎未定。还在谈到底去巴黎、伦敦、挪威、柏林，还是为了孙夫人的健康着想直接去苏联南部。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无法快乐的旅程。

^①*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88.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 7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 页。

^③*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P79, 96, 119.

^④*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89.

根据雷娜 8 月 24 日在船上写给 Grace 的信和比尔在上海与 CID 的人的聊天记录，宋庆龄当初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是靠莫斯科支持建立一个由工农组成的国民党，如果在莫斯科得不到足够帮助就去欧洲然后去美国；第二个方案是留在莫斯科或者苏联的其他城市，协助宣传即将被灾难淹没的中国。^①

船上有三种性质的人，第一种是中国代表团；第二种是苏联人，有十余人，其中有第 6 军军事顾问康奇茨、北伐时第 8 军顾问巴夫洛夫、首次东征时教导 2 团工兵顾问瓦西列耶夫；第三种是包括王凡西在内的去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七十人，其中两人是女生。住宿也是按照这三类来分配的，第一种属于第一等级。虽然雷娜也在第一种内，但一路上，鲁宾斯让雷娜感觉极不舒服，对她的住宿安排也让她极不满意。鲁宾斯是鲍罗廷秘书，在华时一直使用中文名 Fang Shen-shen，上船后突然使用新名字鲁宾斯，但雷娜夫妇还是习惯性地称他 Fang。雷娜夫妇与 Fang 关系紧张，比尔日后向雷娜妹妹格蕾丝介绍此人道：

我还清晰地记得鲍罗廷第一次向我介绍他。在汉口一个大楼上的画廊里，B 正在重病中，他躺在长沙发上，对我说：如果你需要建议或者帮助，去找 Fang Shen-shen，他有两个大脑。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他，他的眼光非常狡猾，是那种天生的阴谋家、坏蛋，他是个恶毒的东西。我记得我去他房间见过他几次，总是闻到一股难闻的怪味，这股味道我几年前住院时又闻到了。毫无疑问，那是福尔马林的味道。我敢肯定他是一个吸毒者。他究竟是什么人，或者代表谁，我并不知道，但是我一直怀疑他是 GPU[苏联秘密警察]。他曾经生活在美国，说的是美式英语，他完全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但是没有机会跟他打交道的人是不会知道的。^②

鲁宾斯对雷娜很刻薄，但宋庆龄对雷娜十分亲切，她主动招呼雷娜和她同住条件最好的船长卧室。

8 月 26 日船抵海参崴，次日夜，他们便坐上火车出发去莫斯科。一路上，雷娜感觉宋庆龄更迷茫了。她说：“我一直无法确定革命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因为她对丈夫的盲目忠贞，还是她身上本身具有猛烈推动她的力量。如果是后者，那就有更多的需要克服的东西：从交际中退缩的本能，对人与事两方面存在

^①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P89,92.

^② 比尔 1935 年 6 月 6 日致 Grace 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P96.

的肮脏所持有的病理一般的厌恶，希望总是由美好事物环绕自己的冲动。”^①

在火车上，雷娜一直在工作，她为宋庆龄起草了一份在抵达莫斯科时准备发表的声明；根据莫斯科《真理报》和列宁格勒《真理报》记者在火车上提出的一长串提问草拟了回答；为宋庆龄起草了 14 页传记，为陈友仁起草了 5 页传记；起草了宋庆龄致工人、妇女和年轻人的问候辞。

9 月 7 日上午 11:20，他们抵达莫斯科。雷娜当日写信告诉比尔说：“有许许多多来自各方的代表。当人群拥挤进来的时候，我被挤到车厢里一个桌子的后面。这些人里有加拉罕、Bitner 和 Joe。还有很多其他人。我们从站台上的人群中挤出去，摄影记者站在火车车厢上、围墙上、汽车挡泥板等等地方，不断地在拍照。Upton Close（笔者注：原名 Josef Washington Hall，中文名侯雅信，Upton Close 系笔名，美国作家、记者，20 年代在华接办《北京导报》和中文报纸《益世报》。）抓住陈的手臂大声要求采访，因为他今天 4 点就要离开这里去德国，还有其他人。孙夫人和 Fang 一起在我们前面。陈、女孩们和我，在外交部翻译的保护下，总算通过了人群。Fang 将孙夫人带进汽车后，车马上就开走了。然后外交部的人匆忙把我们带进另一辆车，带我们去大都会饭店。”^②

宋庆龄在混乱中被单独带走了，这让陈友仁和雷娜都很不安，因为宋庆龄依旧处在晕眩的糟糕状态中，摇摇晃晃地同人见面，当天的情况尤其糟糕。陈友仁向苏方坚持必须让雷娜陪伴宋庆龄，一个小时之后，陈友仁和雷娜被带到异常奢华的糖宫与宋庆龄见面，宋庆龄也善意地要求让雷娜和她一起住在糖宫。

9 月 8 日，宋庆龄、陈友仁一行瞻仰列宁墓，舆论并没有发生雷娜所预想的轰动。

到了莫斯科后，Fang 和陈友仁都否认陈友仁在上海对雷娜和比尔的承诺，不支付比尔在上海的费用，比尔在上海的办事处陷入困境。宋庆龄建议雷娜同时找 Fang 和陈友仁两人当面对质，而不是分别找。雷娜认识到，即使鲍罗廷到了莫斯科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会有他自己的大量麻烦；这里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我收集到消息是他将会妨碍到他们中的一些人。”^③

宋庆龄一行到莫斯科后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受欢迎，雷娜在 9 月 12 日给比尔

^① 雷娜 1927 年 8 月 30 日致比尔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P98-99.

^② 雷娜 1927 年 9 月 7 日致比尔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104.

^③ 雷娜 1927 年 9 月 12 日致比尔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107.

的信中说：“我们这些人似乎被悬在了半空中。我和夫人一起在这里，她看上去并不开心。我能看得出来这一点，虽然她并没有特别跟我说过她不开心的原因。计划并没有进展。在我试着明确谈此事时，她和叔叔（笔者注：即陈友仁，是雷娜为防信件检查所用代名词）都找了大量借口避而不谈。我搜集到的信息是，他们正在见那个大人物，但情况并非像他们想的那么顺利。变得非常明显的是，资金问题绝非上海姿态所让人相信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①

雷娜信中所说的大人物应该是斯大林，据陪同邓演达去见斯大林的章克回忆说，斯大林在与邓演达会谈时提出要把他树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遭到邓的反对。^②

当时，苏联党内正在为追究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互相指责，托洛茨基等认为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修正主义做法出卖了中国的革命，而斯大林则竭力要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斯大林抛出了他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中国革命在经历了以反帝为主的全民族联合战线的第一阶段之后，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相继背叛革命，因此，中国革命必须进入第三阶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于是，就连国民党左派也被视为革命的斗争对象。虽然并不支持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三人准备重振旗鼓的活动，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承担三位国民党左派领袖在莫斯科的接待费用，这也许是对雷娜信中所提上海时期“姿态”的一种曲折回应。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4000美元作派遣费用”，除去用于把莫斯科中山大学的5名国民党学员遣送回国、派人去内蒙古工作外，其余用于陈友仁、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苏联逗留期间的接待工作，全部接待工作由时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委员的叶努基泽负责。^③不过，虽然从中国方面的收入来源已告断绝，但是宋庆龄“自尊自重，不愿接受陌生人的资助”，她个人的生活费用完全由自己承担，以至于在严寒的莫斯科过冬时连件冬大衣都没有。^④

9月16日，Fang陪伴宋庆龄和陈友仁去山里休息，却没带上雷娜，雷娜还

^①同上。

^② 见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276页。

^③ 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71页。

^④ Vincent Sheean, *Personal History*, P325.

被要求于下月初搬出糖宫，她的薪水也支付到 9 月为止。雷娜告诉比尔：“老早就这么做了，夫人不同意，为了我她气得要死，但没有用。”^①雷娜不知道，苏方已正式讨论决定了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在苏联的接待费用问题，但接待对象中并不包括她。

雷娜原本渴望继续跟随宋庆龄，但是 9 月底，Fang 陪伴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等一起去苏联南方的高加索度假时，雷娜再次被要求搬出糖宫。正如雷娜所猜想的，“因为钱袋子变瘦了，又没有允诺过准备填充它的钱进来”^②，没有苏方的支持，带着雷娜来到莫斯科的国民党左派们已无法承担雷娜在莫斯科和比尔在上海的费用，而苏方又不为国民党左派们的组织活动提供任何经费，最后还是宋庆龄亲自出面，委婉地暗示雷娜应该搬离糖宫自谋出路了。雷娜于 10 月 2 日写信告诉比尔：“夫人在继续走她自己的路，一点儿对我表示关心的话也没有。几天前他们到南方去了，甚至连地址都没有留给我。左派就这么抛开了我们。”^③

宋庆龄的确无暇他顾，她正在和陈友仁、邓演达忙于筹建一个由工农组成的国民党，他们三人在高加索并非纯粹度假。10 月 22 日，邓演达在高加索写信告诉他的妻子郑立真：“我来后不久，孙夫人即与陈友仁同到俄来。现在我正与他们在高加索（苏俄南部）地方商议一切，不日或要到德国去，我看你或者会和立三一切[起]到德相会也。”^④三位领袖在高加索的商议是有结果的，11 月 1 日，在莫斯科，三人联名发表了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指导复兴中国革命的工作。

文森特·希恩在所著《个人的历史》一书中说，宋庆龄与雷娜当时产生隔阂，是因为雷娜遵循陈友仁的指示，隐瞒宋庆龄外间流传的宋陈结婚的谣言，让宋很生气。事实上，谣言是在宋、陈去高加索后流传开来的，而雷娜自宋、陈去高加索后就与宋庆龄失去了联系，谈不上向宋隐瞒什么。宋庆龄与雷娜的隔阂是因为是宋亲自出面暗示雷娜离开糖宫，而之后雷娜又一直没有收到宋从南方的来信导致的。不过在宋庆龄从南方回来后告诉雷娜自己曾经给她寄过信时，雷娜便不再

^① 雷娜 1927 年 9 月 16 日致比尔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109.

^② 雷娜 1927 年 10 月 7 日致比尔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120.

^③ 雷娜 1927 年 10 月 2 日致比尔函，P119. 为人们所熟悉的那张 1927 年宋庆龄与邓演达等在高加索的留影，其中所谓的鲍罗廷其实是鲍罗廷秘书 Fang，鲍罗廷本人当时还在回国途中。

^④ 杨资元、冯永宁著：《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8 月版，第 220 页。根据雷娜 1927 年 10 月 19 日写给比尔的信，陈友仁已经于 10 月 17 日独自回到莫斯科。

有受伤感，心情也为之大好，消除了与宋的隔阂。

宋庆龄等去了高加索之后，10月8日，鲍罗廷终于抵达莫斯科。^①鲍罗廷随即忙于整理撰写他在中国的工作报告，“试图写一篇有关过去两年的分析文章。”^②雷娜于是被纳入鲍罗廷麾下，同鲍罗廷一起工作，和鲍罗廷一起离开武汉来莫斯科的青年章克是她的工作助手。自此，雷娜的工作从以国民党左派为中心转向了以鲍罗廷和共产党为中心。11月7日，在鲍罗廷的安排下，雷娜如愿以偿地去红场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典，观看了几乎所有正在举行的活动，但她似乎并没有看到托洛茨基支持者的抗议活动。此时的雷娜正在遭受剧烈头痛的折磨。因为长期工作过度劳累，雷娜染上了脑炎。11月11日，她第一次晕倒，但她没有在意，在与文森特·希恩一起跳舞、喝酒共度“布尔乔亚之夜”后，又去参加了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而组织的苏联之友大会（the Congress of 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召开的一次会议，并深受感动。会后，精神亢奋的雷娜继续与曾经在汉口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罗易进行深谈，直至深夜。第二天下午，她在与中国劳工代表团的领袖们谈话时再次昏厥，这次她彻底病倒了，文森特·希恩把她背到大都会饭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房间以方便有人照顾她。11月21日上午七点五十分左右，33岁的雷娜在莫斯科去世。

11月24日，雷娜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宋庆龄在送葬的人群中紧跟在雷娜灵柩之后，她拒绝希恩让她坐进马车的请求，在严寒中徒步穿过莫斯科市区，颤抖着走完全程。一直避免同宋庆龄等国民党人接触的鲍罗廷没有出席葬礼。

此时，斯大林已于11月14日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③，而对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方面已经正式声明中国国民党的死亡，因此，凡国民党的人员不但不能新入中山大学，而且原来的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一律送回中国。”^④宋庆龄等已经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国民党左派，在经过高加索商讨后，邓演达于12月秘密离开莫斯科赴柏林，宋庆龄在请母亲寄来生活费后，也于1928年4月前往柏林。

结语

^① 见雷娜1927年10月8日致比尔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123.

^② 见雷娜1927年11月2日致比尔函，*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P137.

^③ [波]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著：《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342页。

^④ 邓演达1927年12月27日致郑立真信，转引自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冯永宁教授著《邓演达年谱新编》（未刊稿）。

雷娜书信和日记既是这位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个人经历的写照，也是中国大革命的报告书。结合其他相关史料，一些历史细节从中得以还原，不仅弥补了档案史料的缺失，也让历史生动地再现。这些书信和日记的具体作用在于：细节性地反映了中国大革命迅速失败的进程；初步揭示了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准备重振旗鼓计划的提出过程；间接反映了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在实施计划过程中与斯大林的接触及具体接触时间，印证了三位领袖因为苏方不支持而相继离开苏联的说法；纠正了我们长期以来的许多史实认知错误；具体说明了雷娜与宋庆龄之间的关系由亲到疏的过程。雷娜书信和日记为学者研究中国大革命，以及身处其中的各方力量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同时也是研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经历、作用和心路历程的珍贵史料。

（朱玖琳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副处长）